

讨伐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

李体昱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五四时期新政治和新经济并为其服务的东西。它的产生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产物；是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束缚、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压迫的反映；是中国先进人物自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也是辛亥革命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产生了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为了改变中国这种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努力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中国近代早期的先进人物洪秀全、洪仁玕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均间接地或直接地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们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其中以严复对“西学”介绍的成就为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先进人物中的杰出代表孙中山，他不畏艰辛，百折不挠，希望清政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使国家富强起来。但遭到拒绝，于是他开始消除自己的改良主义影响，转向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毛主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多，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三五九页）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首先是作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被称为近代中国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新兴阶级的成长和壮大，特别是为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895年至1913年近二十年间，中国工人数目有了较大的增加，根据1913年的统计，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已达六十万左右，加上海员、铁路等工人，中国产业工人已有一百多万人。1914年至1919年的五年中，中国工人有了更为迅速的增加，至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左右。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强烈要求进一步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制摧残，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曾经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可

借这个革命没能触动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袁世凯野心勃勃，上台以后，不仅加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还演出了恢复帝制的丑剧。他为了实现其皇帝梦，对外卖国求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内实行横暴的封建专制统治，修改约法，解散国会，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思想理论上他大肆鼓吹复古倒退，强力推行尊孔读经，提倡“祭天祀孔”。于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便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宣扬共和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封建卫道者康有为看到皇帝被推翻，自感其末日来临，精神上空虚不安，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为了恢复帝制，便极力诋毁革命。恬不知耻地以“清朝遗老”自命，创办《不忍》杂志，叫嚷“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梁启超也竭力宣传孔子教义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之终身而不尽”，“道德本无新旧之可言”，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为封建势力扬幡招魂。袁世凯与封建卫道者们此唱彼和，掀起了巨大的复辟逆流。一时尊孔复古、神鬼迷信的乌云弥漫了中国文化思想界。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统治和腐朽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寻求新的出路。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部分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正在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对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封建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地攻击。这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专制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他们以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着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总攻击。陈独秀、李大钊则是高举这两面大旗的旗手和先驱者。

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中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促进了人们民主主义的觉悟，形成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个性解放的热潮。“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无比虔诚地把科学和民主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坚决表示，为了拥护这两位先生，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当时所讲的民主，在政治上是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针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政治，陈独秀提倡在中国建立“立宪共和国”，建立“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主张在思想上冲破孔孟之道、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实行“人权”说。民主在《新青年》创刊号中被称为“人权”。陈独秀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主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妇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权之谓也。（《敬告青年》）”这里所说的“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人人参政。

陈独秀指出，“科学”和“民主”同样是中国所不可缺少的。“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他们所讲的科学就是指与封建迷信、愚昧无知和想象武断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对于什么是科学，陈独秀指出：“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敬告青年》）就是说科学不是凭“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的东西，而是使自己的认识“步步皆踏实地”、“事事求诸证实”。他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予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敬告青年》）

科学和民主作为横扫封建专制主义的所向披靡的旗帜，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给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文化思想以猛烈的抨击和讨伐。

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极端仇视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政治，也反对依靠武力的军阀统治。他们针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明确地指出，“吾国专制日久”，必须“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因而，对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民主主义文化即“自由、平等、博爱”则看作是“近世文明”的精华，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制度和思想都是和这种精神相对立的。“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民国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们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都应该以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作为它自己存在的前提。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必须依靠大多数人民有政治的觉悟，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吾人最后之觉悟》）

对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批判。陈独秀等不仅批判了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思想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指出，在政治上既然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那么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思想也必须铲除。因为它是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吾人最后之觉悟》）他们痛斥“忠孝节义”旧教条是“奴隶的道德”，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的等级制度，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和窒碍个人意志的自由。他们对作为封建专制政治基础的家族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不改革封建的家族制度，根本不能实现共和政体。他们认为“孝”作为巩固封建家族制度的旧教条，是造成家长对子女的独裁统治、腐败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以及祖先崇拜等落后保守思想的理论根据。在封建社会中，“忠”和“孝”这两种旧道德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提倡“孝道”就是叫人服从“忠道”，而其最终目的是驱使人民做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他们认为封建社会中的“礼”和“刑”就是维护其旧教条从而奴役人民的工具。他们还进一步无情地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鲁迅在他所写的《狂人日记》的小说中，借用狂人的口吻，

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加以严厉的批判：“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对在封建纲常礼教蹂躏下的全部黑暗历史的十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要争取民主，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学说一直是封建剥削阶级维持反动统治和奴役人民思想的支柱。直到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一班人才勇敢地正式对孔教宣战，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子。他们大声疾呼：“冲决过去历史之纲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他们认为，孔子学说是维护专制帝王的利益，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相敌对的，是和“民主”“科学”的思想绝不相容的。“今效法汉武之术，罢黜百教，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宪法与孔教》）因此，他们号召，“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的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宪法与孔教》）他们针对复古派们定孔教为“国教”的喧嚣，严厉地指出，孔丘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身符”，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是“专制之宪法”，是“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他们为了同孔子之道彻底决裂，“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在批判封建专制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同时，还依据当时所了解到的科学知识（如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个最伟大的发现），对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新青年》宣传无神论，号召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以科学代宗教，凡是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一切不合理的信仰，都应该予以破坏。凡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被他们斥为“万万不足相信的”“妖言胡说”。无神论的宣传有力地戳穿了反动军阀企图以“鬼神之畏”愚弄人民的反动阴谋，扫除了迷信，因此赢得了当时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纲领和横扫愚昧无知，盲从迷信的战斗旗帜，向着腐朽顽固的君主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迷信思想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秩序、旧文化、旧思想。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启发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自觉，使人们从传统的政治束缚和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摆脱了封建精神的奴役。不仅如此，它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当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由于受了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洗礼和鼓舞，思想空前解放，觉悟空前提高，当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他们即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遂后又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陈独秀由于主观上的原因，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在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

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毛选》合订本788页）

可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观点还是不彻底的。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他们反对军阀专政而要求“民主”，但并不动员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他们对于文化思想的理解，还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观点。既然相信历史是进化的，但又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相反地，是轻视群众。他们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和新思想的介绍，也还是形式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政治思想上看，还没有超越辛亥革命家的范围，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提倡和宣扬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等，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要求，它所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五四时期，对旧中国、旧礼教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对封建统治者不抱幻想、对资产阶级共和国、议会政治、资本主义文明抱怀疑态度的先进人物的代表，是李大钊、毛主席和周恩来。

以毛主席、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扬。这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经得起考验，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奋斗成为整个人民胜利事业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毛主席在五四时期的革命事业，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打倒孔家店急先锋的陈独秀，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在后来转向更新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时，却是比较落后的。由于他始终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特别是以“先觉哲人”自负的沉重包袱使他根本看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致他不仅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斗争的紧急关头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实行了卑鄙下流的叛变，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在五四运动的发展道路上，一部分不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下和敌人妥协，终于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而站在反动方面去了。以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为集中代表的一部分人，就是五四时期走向投降的一股逆流，他们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作为反封建的精神武器，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那时还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将其改造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自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以后，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科学和民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即无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无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它较之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无论在内容上，性质上，也还是在作用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条件较之六十年前，已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正以豪迈的气势，冲天的干劲，在

党中央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艰巨的事业，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宏伟任务，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就需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缺少民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出来的。建国以后党和毛主席虽然花费了很大气力进行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开展了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斗争，但封建主义观念、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习惯毕竟是根深蒂固的，民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特别是在近十几年里，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其残暴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原则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民主大发扬，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大大繁荣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四个现代化。

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精神，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上接第3页)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就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了呢？不，决不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是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把理论置于它的真正基础——实践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只有理论在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如果不接受实践的检验，它就不能指导实践。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是理论到实践这一认识阶段的两个方面，理论只有指导实践，才能检验它是否正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指导，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相反，如果不坚持这个观点，把本本上的某一句话，把某个权威人士的某种意见作为真理的标准，那才是真正否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人类千百万次的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真理，它像一盏明灯一样，照耀着人们在实践的道路上，不断发现真理，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